

张载科举观及对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影响

田建荣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张载的生平实践进行研究,着重探讨其科举观以及对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影响。研究认为,“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是张载关于科举态度和举士观点的集中阐述;张载这种反对以应举为目的和片面追求科第功名的考试思想,不仅对当时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也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关键词:张载;科举观;关中士人;教育观念

中图分类号:B24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1-0008-05

经由唐代的奠基,科举考试在宋代进入全面改革和发展时期。北宋时期的科举考试克服了创始时期不够完善的缺点,考试制度进一步客观化、严密化。加之统治者的提倡,参加科举考试已经成为当时的士人步入仕途、实现政治理想的最重要途径,进而对于确立宋代文人士子的价值观念、教育思想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北宋著名的陕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关学领袖的张载,其关于科举的态度和举士,既与其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有关,又极大地引导着追随他的历代关中士人。张载一生“敬科举而远之”的科举态度,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一定的独特性。本文将主要通过对他生平实践和点滴的论述,阐明张载独特科举观的形成及其对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影响。

一、对科举的冷淡—— “孰能少置意科举”

唐宋以来,古人教育的目就是应举。时宋真宗曾作励志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几句话把天下读书人都吸引到科举道路上来。张载

从小天资聪慧,好学上进,十岁出就外傅,并且“志气不群,知虔奉父命”^[1],深得父母的喜爱。被迫寄居陕西省眉县横渠镇后,张载种地耕田,侍母教弟,挑起了全家生活重担;与此同时,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也许为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然而当时西夏常对西部边境侵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初,西夏入侵,庆历四年(1044)十月议和。朝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这对“少喜谈兵”^[1]的年仅21岁的张载刺激极大。

早在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张载18岁时,他就与邠(今陕西彬县)人焦寅游,二人常谈论军事,慨然以功名自许,报效国家,“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1]。康定元年(1040)夏,范仲淹任陕西招讨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张载至延州上书范仲淹,提出自己的9条军事主张:清野、回守、省戍、因民、讲实、择帅、择守、足用、警败。范仲淹看后很赏识张载的才能,为了成就他,劝他读儒家经典,弃武从文。张载接受了范仲淹的劝告,回乡读书。从这年起直到38岁,张载一直埋头于治学读书:先读《中庸》,认为未足也,于是又研读诸释老之书,累年尽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最终形成了自己理

收稿日期:2012-12-05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N016)

作者简介:田建荣(1964-),男,陕西彬县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学学说^[2]。

在形成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过程中,张载一生著就了大量书籍,然其著述中很少提及与科举有关的内容,有关他如何教弟子登科举士的记载也很少。反倒是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张载47岁,应京兆尹王乐道礼聘到郡学讲学。讲学中,张载“多教人以德,从容语学者曰:‘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学者闻法语,亦多有从之者。”^[1]可见,张载研究和讲学的宗旨是强调以德育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提倡或者反对为应科举、求利禄而学习,他告诫学生要少留恋科举,多关心和学习与实学有关的治国防边大事,并且他的这一主张还受到当时不少人的拥护和响应。

我们从张载及其历代关学人物的人生轨迹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大多不留恋科举,淡泊富贵名禄,主张经世致用,解决实际问题。张载弟子吕大临,重视人才选拔,主张改革吏制,选贤任能,建议“立士规以养德厉行,更学制以量才进艺,定试法以区别能否,修辞法以兴能备用,严举法以核实得人,制考法以责任文功”^[3]。企图用这些措施发现人才,运用人才,使真正有才能的人担任国家各级官吏。张载另一弟子苏昞,听从张载教诲,不留恋于科举,一生追求学术研究,以倡明关学为己任。元祐末年,吕大忠上书荐举,认为苏昞品性善美,学习勤勉,立志不变,年近四十,不求仕进,跟随张载学习,为门人之秀。于是苏昞以布衣征召为太常博士^[4]。中兴关学的吕柟,在收徒讲学中常常说:“文必载道,行必顾言,毋徒举业,以要利禄,毋徒任重,弗克有终,日孜孜唯一古圣贤进德修业为事。”^[5]

与此相配合,以张载为首的关学派思想家,都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强调道德教育对于改造人性的重要作用,其终极教育目标在于学如“圣人”,即“立人之性”,“学所以为人”^[1],“学必如圣人而后已”^[1]。然而,圣人的特殊风貌是“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1],就是能尽天地之性,不为气质之性所障蔽。但“今之学者大率为应举坏之,入仕则事官业,无暇及此”^[1]。所以,张载就要疏远科举,冷淡科举,故意敬科举而远之。他试图通过蒙学和书院教育,特别是经由在书院和学校中受过教育的士人的宣传和践行,将关学蕴涵的“道德”理念变为民众的“德行”,再将个体的“德行”演化成为村落整体的意识形态,成为村落公共事务的处理原则,并形成再生机制:一是村落内部个体对于道德修养的追求,二是村落整体对于道德生活方式的追求^[6]。如此,

通过一个村落接着一个村落的调理,最终就能建成他理想的大同社会。

从张载的科举观可以看出,宋代关于人才培养与人才选拔的关系仍在调整中,虽然“重科举,轻学校”在唐代已出现,但宋代使其发展成为只重科举取才而忽视学校育才,进而导致一些士子专攻举业而不屑接受系统知识学习和养成良好道德的严重弊端。至宋中叶,学校育才与科举取士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围绕三次兴学运动,当朝大臣曾就兴学育才和考试选才展开了激烈争论。虽然张载没有直接参与到这场论辩中,我们也不能因为张载曾不支持王安石变法就认定他支持苏轼的观点,特别是他和苏轼兄弟还是同年,并得到范仲淹的指点。事实上,鉴于后来学校取士也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其优点并不明显,反而不及科举取士更能保证质量,体现国家的意志。所以,学校与科举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并没有能够解决,张载的冷淡也可以解释为是对科举持中庸立场。这也正说明学校育才和科举取士之间,既有统一性又存在着矛盾性,因为学校和科举各有其自身的社会功能,企图用学校教育来代替科举考试,或只重视科举考试而无视学校存在,都会产生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在学校与科举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使其相互促进、良性发展,才是古今仁人志士共同的追求。

二、消解科举的策略——提倡兵农实学

张载教育思想的最高目标是培养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人”。基于此,在张载的教育思想中,还特别重视教学与社会实际的紧密联系,注重“行”,主张“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学贵有用”、“道济天下”,反对空谈不行,学而不用。这是“关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传统优势。为了消解科举对士子们的影响,体现关学经世致用的宗旨,解决当时朝廷重大问题,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张载尤其重视研究和发展与军事、农业及科技有关的学问,并将“兵学”、“井田”和天文等内容引入教学过程中,造就实用人才。

年青时期的张载曾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观察、思考边事方面,初步具有了注重研究实际问题、学贵于用的特色追求和教学目标。中进士后,张载先后任祁州司法参军,又迁丹州云岩令,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等职。在任云岩县令时,办事认真,政令严明,

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让他们转告乡民。在渭州,他与环庆路经略使蔡挺关系甚密,深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协助蔡挺筹办边务。“渭帅蔡公特所尊礼,军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从事,所以赞助之力为多。”^[1]张载还曾说服蔡挺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并创“兵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还提出罢除戍兵换防,招募当地人取代等建议。他撰写了《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经略司画一》和《与蔡帅边事画一》等,展现了相当的军事政治才能。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适逢其弟张戡以语犯王安石变法被贬为公安(今湖北江陵)县令,张载遂以病为由辞官归陕西眉县。回到横渠镇后,张载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为了训诫士子,他作《砭愚》、《订顽》训辞(即《东铭》、《西铭》),书于大门两侧。其中,张载对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写的《井田议》上奏朝廷,并与学生们买地一块,按照《周礼》的模式,划分为公田、私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当地农民,并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7]。今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有其遗迹,并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张载师徒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他们对天文、地理、医学、算历等都很有成就。张载以其天地皆动说、月蚀论、生物学、环保说等,展开了对自然科学的可贵探索,开启了中国近古从实学角度研究实证科学的先河。张载认为:“地有升降,日有修短”,“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他指出:“古今谓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论尔,不考日月出没、恒星昏晓之变。愚谓在天而运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为昼夜者,直以地气乘机左旋于中,故使恒星、河汉因。”^[1]张载认为,地球转动、恒星昼夜出没,均是由于地球自转所致。他对地球自转有如此明确的认识,已经触及到地球自转原因在于地磁内力这一问题。张载关于月亮的盈亏说,则更科学和确定一些,他说:“盈亏法:月于人为近,日远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于外,人视其终初如钩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1]此说与现代天文学观点接近,只是欠精确而已。张载对自然科学的探索精神,由其弟子李复等加以继承和发展。李复著有《论月食》、《震雷记》等文,其研究领域广及天地、人文、军事、“律占”、中医

药学等^[8]。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关学学者重视自然科学并力求辨妄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

三、并不是要废除科举—— 张载嘉祐二年中进士

曾枣庄先生《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一书,专门就嘉祐二年贡举的考官和进士,并论及与他们有关的家族、门生和乡人,全方位展现了嘉祐二年章衡榜之群星灿烂。的确,从嘉祐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至三月五日宋仁宗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得章衡以下388人。此榜中进士者多为北宋当时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例如,熙宁、元丰年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邓绾、王韶、吕惠卿、林希、曾布等变法派人物,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轼兄弟,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张载、程颢,政治倾向不太明显而在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曾巩及妹夫王补之,门人王回、王向兄弟,均于此科及第。可以说,北宋政治界、思想界、文学界的各种代表人物都在这一科中崭露峥嵘,闪闪发光。但如果按地域分,则很不平衡,“北方各省仅《陕西通志》卷三〇载嘉祐二年章衡榜进士两人:吕大钧(蓝田人)、张载(眉县人)。”^[9]

我们说,作为有报国之志的古代儒生——张载,他必然会参加科举考试。幸运的是他受知于座师欧阳修,并与苏轼、苏辙兄弟以及吕大钧等同榜登科,一举成功,留下了一段文坛千古佳话。其实,张载之弟张戡,在母亲和张载的教导下,早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53)24岁就高中进士,这比张载本人中进士还早了四年。张戡(1030~1076),字天祺,幼年庄重老成,不善嬉游。稍长,酷爱读书,不喜为雕虫之辞以从科举。在母亲和张载的劝说下,才勉强应试乡贡,后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先后任陕州阌县主簿、凤翔普润县令、秘书省著作佐郎,知云石、金堂、蒲城等县事,后改转为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还被连续贬为江陵公安县令、夏县转运使、凤翔府司竹监至病逝。张戡比张载的政坛阅历还丰富。

当然,张载在中进士前就已有文名,在横渠“崇寿院”张载教授的弟子大部分都是快要登临科目的秀才、举人,还有一部分是县令、知州、通判、学正等中小官吏。此番张载中第,虽是其长期刻苦治学、安贫乐道,在自我感到学问已自成一家后做出的决定,但能够一举成名还是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唐末宋初以来,为应付科举考试,文人们专习辞赋声律,社会上形成了为猎取功名而崇尚浮华、险怪、奇涩的空

疏学风,号称“太学体”。但这次张载赴汴京参加科举考试,恰遇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权知贡举,欧阳修推崇韩愈“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的精神,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糜雕琢和怪僻晦涩,主张文章要文道合一、切于实际。所以在这次进士考试中,欧阳修大力排抑“太学体”,一律取消其录取资格,擢拔朴实文风之考卷,这虽然招致以文章取功名的落榜者大为不满,但是,经过欧阳修的这次整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10],张载与苏轼兄弟、曾巩、吕大钧等人也幸运地同榜登进士。

至此,张载不仅为科举服务,养成科第人才,还直接参与并教导其弟投身科举。也就是说,张载并不是想要废除科举制度,只是深知以往的科举考试选不出真正的实用人才,他试图协调进德与功业的关系,理顺进德与功业的次序,希望生徒首先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在养成良好的德行基础上从事举业,他本人就是在感到学问已经自成一家后,才赴汴京应考。张载这种严谨、独特的科举观留给我们现代许多思考和启示。

四、对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影响——“关中士人宗师”

关学自张载创立,至南宋衰微,明代又复续并发展到全盛。从北宋到清初,关中地区学人迭出,流派纷呈,虽无严格的师承授受关系,但大都尊张载为“关中士人宗师”,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张载的影响,继承了张载的学术旨趣,由此而形成了客观上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学术宗旨、价值追求和治学作风。进而,关学成为宋元明清时期理学中的一个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学术流派。《宋史·张载传》曰:“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为横渠先生。”

张载一生,当官时间很短,毕生主要是著述和教学,培养了吕大临、吕大钧、苏昞、范育等一大批著名关中学者。张载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为指导,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他的教育实践。在他的“贤弟子”中,尤以吕大钧、吕大临两兄弟最为知名。吕氏兄弟在张载门下学习多年。吕大钧为人朴实厚道,有着关中人特有的性格,和张载虽为同榜进士,却因仰慕张载的品行,拜于张载门下。吕氏兄弟受张载影响并对关学最大的贡献是创制了《吕氏乡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较为完整的乡约,是最早的一部村规民约,在关中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规范了农村民俗礼仪,增强了关中乡人的自主意识。吕氏兄弟

曾希望将《吕氏乡约》从本乡推行到蓝田,再到关中,最后扩之天下,传流后世;后来虽流布没有那么广大,但确实为关中地区民风民俗的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赞之曰:“横渠之教,以礼为先,先生条为乡约,关中风俗为之一变。”^[11]

“关中自古帝王州”,豪杰意识和对遥远的汉唐气象的追忆蕴藏于每位关中士子的胸中。张载之后,关学的代表人物有:元代乾县人杨奂、长安人杨恭懿;明代有渭南人薛敬之、三原人马理、高陵人吕柟、朝邑人韩邦奇、富平人杨爵、长安人冯从吾;清代有华阴人王宏撰、眉县人李柏、泾阳人王征、周至人李颙、富平人李因笃、户县人王心敬等。明代大儒王守仁曾感叹曰:“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12]正是经过这些学者薪火相传地学术探索,形成丰富的学术成果,培育了独特的关学精神,这对陶铸关中人以至陕西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魅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由张载所开“躬行实践、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在他们身上都留有深刻的印迹。冯从吾所面对的是晚明王学空疏学风日渐泛滥的学术局面,却能以救时弊为己任,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风格,开明末西部学术向实学转向之先^[13]。王征(1570~1644)不仅精通儒学,还和当时来明朝的西方传教士交往甚密,积极学习西方科技和拉丁文,著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14]。

另外,明清时期的两位陕籍状元,不仅是德行文学俱佳的硕学鸿儒、时代精英,而且为官颇具政声,刚直不阿,气节不凡。吕柟,明正德三年(1508)考取进士第一而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时宦官刘瑾前来恭贺,并企图委以重任,被吕柟拒绝,并上疏请明武宗入宫亲政,消除乱源,刘瑾欲谋害之。刘瑾伏诛后,他上疏言十三事自劾,语甚切直,帝览疏大怒,下诏狱拷讯,贬往山西解州判官。在任上,他怜恤孤独,减免丁役,劝勉农桑,兴修水利,筑堤护盐池,深得民心。王杰,乾隆二十六年(1761)中第十名进士,乾隆皇帝亲阅试卷,圈点王杰为头名状元。他初授翰林院编修,累加官进爵,先后历任工、刑、礼、吏部侍郎,充上书房总师傅,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为官清正刚直,为人生活简朴;数充乡、会试考官,被誉为“衡文巨眼”^[15]。

五、结 语

总的来说,正如著名关学研究专家陈俊民先生

在其《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一书中所言:一般地说,关中学者,年轻时,多因“勤学”、“笃行”、超群拔俗而登进士第;接着,被人举荐为官,其官职又多半同学术有关:或为京师“御史”、“修撰”,或为某地“学正”、“提学”;但因“以气节著”,必然在腐败的官场遭受排挤,而后去官还乡,专心致学^[16]。这大致也是张载关学思想影响下的关中士人独特的精神追求和共同的学术命运。

参考文献:

- [1] 张 载. 张载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8.
- [2] 张世敏. 张载年谱[EB/OL]. (2002-11-20)[2012-09-15]. <http://www.confucius2000.com/zhangzaici/zzain-ianpu.htm>.
- [3] 韦 维. 传衍关学的吕大临[J]. 理论学刊,1987(4): 48.
- [4] 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咸阳市志[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 [5] 向 盱. 中兴关学的吕枏[J]. 理论学刊,1987(10): 48.
- [6] 董敬畏. 关学理念与地域文化:以关中邓村为例[J].

- 文化学刊,2011(3):78-87.
- [7] 龚 杰. 张载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8] 李泽鹭. 张载实学的历史定位[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1-5.
- [9] 曾枣庄. 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 [10] 宣朝庆. 大家精要:张载[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 [11] 黄宗羲,全祖望. 宋元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2]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3] 刘学智. 冯从吾与关学学风[J]. 中国哲学史,2002(3):73-79.
- [14] 李钟善,陈敏钰. 陕西历代教育家评传[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 [15] 杨学为. 中国考试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6] 陈俊民. 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ZHANG Zai's views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Guanzhong scholars' educational concept

TIAN Jian-rong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ocumental analysis, ZHANG Zai's whole life practice, especially his views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ir influence on Guanzhong scholars' educational concept was studied.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e less infatuated with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work hard to learn to become a saint" demonstrates ZHANG Zai's attitude toward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his view on the selec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Not only did ZHANG Zai's opposition against taking examinations merely for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and in blind pursuit of fame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zhong scholars' educational concept at that time, but it also is of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modern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ZHANG Zai; view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scholar of Guanzhong; educational concept